

西方人視野中的寧波地區

耿昇*

寧波是中國最早開展海外貿易的港口之一，在我國海外貿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有關寧波地區的中文史料相當豐富。16世紀以降，西方許多外交家、旅行家、航海家、科學家、商客、傳教士和遠征軍將士對寧波作過詳細論述。本文選擇了七種外文史料，反映了不同人物，從不同角度，根據不同立場對寧波地區所作的親歷性記述，既可以補充中文史料之不足，又可以開拓我們的視野。

寧波，唐稱明州，自明代起稱寧波。寧波地處祖國東南海濱，航道四通八達，交通便利，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是我國最早開展海外貿易的港口之一，在我國海外貿易史上佔據重要地位。寧波也是中國沿海地區的歷史文化名城，至今尚保存有許多有關中外交流（以與朝鮮和日本的交往為主）的遺址和佛教古建築。寧波是中國最早設立提舉市舶司的港口之一。鴉片戰爭之後，寧波又屬於五口通商的港口之列。寧波地區物產豐富，它與舟山一併形成我國的最大漁場。寧波也是中國最早和最發達的工業產地。無論從經濟、文化、宗教和航運方面，寧波及其附近的舟山群島，都曾扮演過重要角色。在商業方面，寧波有一個歷史悠久和功勳卓著的寧波商幫，重鄉情鄉誼，樂於造福桑梓；在文化方面，寧波也擁有一個以經學和史學相結合的浙東學派，經世致用，一脈相承。對於寧波及其毗鄰的舟山地區，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作用和地位問題，中文史料已經相當豐富了；特別是自16世紀以來，西方許多外交家、旅行家、航海家、科學家、商人、遠征軍將士和傳教士，都對寧波與舟山地區作過生動而又逼真的描述。他們之中有的人客觀公正，忠實地刻劃了寧波地區的真實面貌；有的人則是西方殖民主義遠征軍的成員，仰仗其主子

的堅船利炮，打開寧波港之後，又記錄下了他們侵佔寧波地區的醜惡行徑。寧波港有過輝煌歲月，也有過忍辱負重和遭受侵略的歷史。筆者擬對不同西洋人從不同角度，對寧波地區留下的著述略作鉤沉，以再現千年寧波港的一部榮辱史，從而使人看到寧波與中華民族的命運休戚相關、榮辱與共。

入華耶穌會士李明的《中國現勢新志》⁽¹⁾

李明（Louis-Daniel le Comte, 1655-1728），字復初，法國入華耶穌會士。李明於1655年10月10日生於法國波爾多，於1671年進入波爾多耶穌會初修院。他受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遣，於1685年乘船從法國出發，經暹羅停留後到廈門，於1687年7月23日到達寧波，於1688年2月7日進京。他在北京居住四年之後，於1691年從廈門出發歸國，1728年4月19日逝世於法國波爾多。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遣了由蕭蒙騎士（Chevalier de Chaumont）和舒瓦齊（Choisy）伯爵率領的使團出使暹羅。其中有六位享有“國王數學家”頭銜的法國耶穌會士同船赴中國，包括李明神父。李明本人是天文學家、自然學家和地理學家。當李明在中國停留時，“中國禮儀之爭”正如火如荼

*耿昇，1946年生於河北阜平，1968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會長，長期以來從事有關中外關係史和中亞史的研究與翻譯，現已出版譯著五十餘種，譯文四百餘篇，論文近五十篇。

地在歐洲蔓延。李明出於護教的需要，極力為中國禮儀辯護，故在回國後於1696年出版了《中國現勢新志》一書，記錄他於1685-1692年赴遠東尤其是入華的經歷。此書於1700年便遭巴黎大學封殺；過了近三個世紀，法國巴黎才於1970年再版此書。此書是以致法國學術界和政界要人書簡的形式寫成的。其實，這都是他的論著，“致某人書簡”一說，均為託辭，以避開宗教裁判所的制裁。李明於他致法國當時的財務總監和海軍部國務秘書、後來出任法國首相的蓬查特蘭（de Pontchartrain）的書簡中，描述了他剛剛到達寧波的真實面貌。

經過長時間在礁石間持續趕路之後，我們終於發現一個叫作定海（Tim-hai）⁽²⁾的小城，也就是一個能鎮定大海的城市。它位於一條江（清代大浹江，即今之甬江）的入海口處。我們隨着漲潮進入該江，並且在上游3法里（lieue，每古法里約合4公里）處靠近寧波（Nimpo）的地方拋錨。寧波是我們旅程的終點站。我們經歷了持續不斷的危險、極端的酷熱、饑餓、乾渴和行船中的不適，經過三十六天的航行，才到達寧波。這些苦難使我們的航行極其艱難。

當我們首次看到大陸時，內心確有一種心潮澎湃的歡愉，因為我們很久以來就希望把福音之光播到那裡去。（……）儘管我們已接近寧波城，但要想進城並非易事。中國是一個行政手續繁瑣的國家，法國人比其他任何民族的人都更需要冷靜，所有外國人在那裡都必須耐心地等待。當我們到達寧波時，船長認為必須把我們藏匿起來，將我們安置在船舶的底艙。氣溫隨着船舶接近陸地而陡昇，還有其它多種多樣的不便，簡直使我們陷入筋疲力盡之中了。儘管我們採取了小心謹慎的措施，但最終還是被發現了，一個海關僱員發現了我們。在對船艙貨物作了一番清點之後，他又設立了一個崗哨，於是便出去報告其主子了。這名官吏是由朝廷直接派遣的，為此他在省裡頗受尊重。他下令將我們押至大堂，那裡有他的許多助手和低級官吏。我們在無數居民的簇

擁下進入那裡，他們希望看到歐洲人的興趣，比我們要瞭解中國人的好奇心更加強烈。

我們被帶進了衙門大堂，官吏們於大堂後部依級列班。有人要求我們行九叩大禮，依當地習慣跪拜正堂官吏。他在該省代表皇帝本人。這些官老爺們的態度極其冷淡，以一種令人肅然起敬和不寒而慄的姿態出堂。當我們看到他們周圍的那些獄吏時，更增加了自己的恐懼心情。獄吏中有些人手持鐵索鏈，其他人則武裝以大棍棒，始終準備在官吏稍作暗示時，便將官吏希望懲治的人捆起來或打板子。他將我們扶起來之後，便詢問我們是誰？準備在中國幹甚麼？

中國駐紮在寧波城的軍隊大約有一萬五千到兩萬人，駐軍的將軍非常高興於其大營中接待我們。他以世界上最誠實的姿態對待我們，當我們離開其大營前往知府大堂時，他又派一名軍官到知府那裡，請求知府友好地接待我們，並使知府確信，我們也是世界上最誠實的人。知府以某種特殊禮儀接待我們。但他在與該城最重要的官吏協商之前，不想解決任何問題，以致我們還必須回到船上，而船艙對於我們就像是非常殘酷的牢房一般。

我們一踏上寧波的土地，便得到足夠的資訊，知道了自己可以在那裡從事的善事。我們把這一切看作是家長分配給各自的一份工作，正準備進入角色並享受這種優待。（……）我們剛到寧波時就採取了防範措施，否則我們就會不可避免地陷入險象環生的局面。我們曾致信意大利傳教士、傳教區的會長殷鐸澤（Intercetta）神父，請求他接受我們在他的主持下傳教佈道。

李明神父在致伏爾斯滕堡（Fürstenberg）紅衣主教的書簡中又指出：

中國的第四個港口叫寧波，位於中國的最東部海岸。這就是我們停泊靠岸的港口。進入該港口十分困難，大船不能駛入，因為入口處存在着河洲，即使在大潮時，水深也不會超過15法尺。

但那裡卻從事大規模的交易，中國人從那裡出發，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到達日本長崎，祇有兩天的航程。中國人向日本出口絲綢、食糖、藥品和燒酒，並從那裡運回銅、金和銀。

寧波是一座一級城市，往昔其規模很大，由於近期的戰爭，它已幾乎被毀成廢墟了。特別是由於中國海盜鄭成功（國姓爺）助明抗清，使清政府於1662年決定從山東到廣東沿海“淨邊”。該城現在每天都在恢復舊貌，城牆處於完好狀態，城郊人口眾多，駐軍數目龐大。人們在街上還可以看到大批古建築，寧波人稱之為牌坊或牌樓，這在中國是司空見慣的現象。那裡有三座並排的大門，用長條大理石建築在同一條線上。中間的那座門要比其它兩座門高大許多。大門橫樑承柱是用四根大柱子或大樑建成的，柱子有時是圓形的，最常見的卻是方形的。其柱石為一整塊石，放置在一種很不規則的地基上。甚至有的柱石放在地基絲毫未露出來的地方，或者是那裡從來就不曾有過地基，或者是那些地基被逐漸地埋沒了，人們從中絕不會看到柱頭，柱身直達或鑲嵌在額枋中，……上面鐫刻有題記、圖案和美不勝收的淺浮雕、突出的帶飾，它們都被鏤空並互相交叉，還有精工雕刻的花卉，幾近於舉世無雙的精美飛鳥雕刻，似乎即將以不同姿態展翅飛翔。我覺得其中每一件作品都精美絕倫。

我並未聲稱，這些裝飾在所有牌樓上都是同樣的精工細作產品。其中有數種也很粗糙，甚至不值得對它們作研究，有些裝飾卻是怎樣高估也不為過。人們在上門楣前後安置了寬大的大理石板。作為屋頂，這一切構成其全部頂飾。在寧波，這類橫跨街道的牌坊太多了，它們於幾處甚至對街道的阻塞遠超過其裝飾作用。遠遠望去，這一長串門樓不失構成一種令人賞心悅目的美景。

李明神父在“中國禮儀之爭”事件中，極力為中國禮儀辯護，與教廷和巴黎大學抗爭。他對中國的描述，一般都是贊美性的，對寧波地區的描述也不

例外。我們通過他的描述，尚可以窺見寧波於17世紀末葉的繁榮景象。

法國入華耶穌會士加略利的 《1838年的中國沿海行記》⁽³⁾

法國入華耶穌會士加略利（Joseph-Marie Callery, S. J., 1810-1862）入華時間不詳，他在澳門學習漢語多年之後，曾屢遭失敗地和千方百計地多次試圖潛入中國內地或朝鮮，想往那裡傳教佈道。1838年，他隨一批鴉片商人在中國沿海活動。他的遭遇與德國人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的行徑極其相似。郭氏也是在無法於中國內地立足的情況下，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的英國侵華軍進入中國的。繼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之後，加略利終於可以在中國居住了，並經常為西洋人充當翻譯。他於1860年初，陪同一名被牽涉進太平天國起義事件的中國人，返回了法國。加略利在返法後不久便逝世，受他保護的中國人成了高狄埃（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女兒們的中文教師。高狄埃是法國19世紀的著名詩人、小說家、評論家和新聞記者，是法國文學從早期浪漫主義向唯美主義和自然主義轉化的奠基人，他的東方學知識大都來自傳教士們。

加略利在中國時，曾決定利用在中國北部海岸從事鴉片交易的歐洲商船，以便到達韃靼地區，再從那裡輾轉去朝鮮。他於1838年6月搭乘的那艘英國船直駛寧波，並在涌城成功地將其船艙中的鴉片銷售一空。經過在寧波地區佛教聖地普陀山停留之後，他無法再向北京行進，而被迫返回澳門，這使他非常失望。鴉片戰爭之後，他才最終進入中國內地，後來又經常為法國軍人和外交家充任翻譯。加略利於1838年10月26日寫於澳門的一封致巴黎外方傳教會神學院院長的長信中，介紹了他在中國海岸的旅行。這封長信發表於他在1838-1860年間寫的《1838年中國海岸旅行記》一書中，後由《旅行新年鑒》節錄發表，未註明出版時間。

我將向您詳細介紹本人在中國海岸的旅行……。陶若翰（Torrette）先生首先想出了利用歐洲人在中國北部海岸從事鴉片交易商船的主意。最早對這種辦法的反對及讚成意見各佔對半。但自從一名遣使會士於今年3月在寧波獲得幸運成功之後，又導致眾人最終一致同意了這項倡議。因此，法國的兩位司庫聯合了新近蒞華的一批傳教士，向在廣州的英國商人搜集了許多資訊，採取了多項措施，從而獲得了一艘駛往舟山的大船，最終決定與羅神父（Claude Guillet, 1811-1859, 1851年在寧波）共同乘船，分赴各自的目的地。我將在寧波登陸。陶若翰先生有一名自稱是該城客棧老闆的通信人，是該地諸多基督徒們的朋友，熟悉可以方便我們行動的一切手段。此人與我們同時登船，並提前下船以為我們進入中華帝國作好一切準備。他必須在寧波為我們物色一大批可以信賴的報信人，然後分別將我們送到浙江、江南、山東、北直隸並直達韃靼地區。

我們將被迫一直到達寧波城本地，以尋找自己需要的一切東西。當四名中國官吏聽到“寧波”城時，如同五雷轟頂一般：“啊！我們要多加小心。如果你們一直到達寧波，那麼你們在那裡就不會受到善意招待，可能會與當地政府發生嚴重衝突，甚至會非常嚴重地影響到我們。你們最好是於此採購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同一天午夜之前，我們發現一隻船不聲不響地靠近了我們。這就是我們的信使於前一天為我們租好的船，用它將我們送到寧波城，而由於害怕中國官吏，該船不敢白天前來迎接我們。

聖母昇天節那一天，負責引導我們登陸的那位信使，從寧波趕來了。這一次，我們相信自己忍受苦難的時間已經過去。信使登船向我們宣佈，在寧波上岸不會遇到障礙，但寧波城正被我們西方人和前幾天到達的海盜搞得沸沸揚揚，官吏們正密切監視着從海上前來的任何人，所有的船隻和行人，都受到了嚴密監視、檢查和詢問。總之，我們不能通過這條管道進入中國大陸，最好是原路返回澳門。

我對他說：“難道你在自己家中或在你的朋友中，不能找到任何可信賴之人，以通過可靠的道路或繞道，而將我們帶到那裡去嗎？”他回答我說，他從不住在寧波，那裡也沒有任何熟人。由於在北京爆發的教案，我們今年不能進入朝鮮了。我們祇好繞道舟山群島，去普陀山了。

從8月16日起，我們便開始對“72塔島”（普陀山）作考察了。一大清早，我們便啟錨直駛普陀山。我們的船長希望能在這裡銷售其鴉片。但惡劣的天氣迫使我們前往一個叫作六橫島的大島附近停泊，並且在這裡停留三日。我們於此以經常性的陸地散步去排除煩躁心情，同樣也為這裡植物和風景的多樣性而感到高興。從該島居民的衣着和住宅門面來看，他們都非常貧窮。但有人向我斷言，這是有意地裝窮，完全是為了避免激起當地官吏們的貪心和隨之而來的強奪豪取。

我們於8月19日一大清早就離開了六橫島。如果我們有精確地圖的話，那麼當夜就可以到達普陀山。但由於我們的中國海岸地圖，自Tching-tcheou（漳州）之後便錯誤百出，有時純粹是根據臆想而繪製的。我們必須立即到達海灘並於次日去尋找自己希望去的地方。我們甚至難於在第二天到達舟山群島，於是便派人去向生活在孤立岩石島上的漁民打探消息。由於這些善良的人向我們提供資訊，以及始終仔細探索的謹慎行為，我們才得以於下午在一個由洛伽山和普陀山形成的港灣中安全停泊。

受到中國人和近代旅行家們大加贊揚的普陀山，是中國最神聖的地方之一，在這裡祭祀的中國人承認所有的神祇。它遠離了商賈們的競爭和大城市的喧嘩，僅由僧侶們居住，在某種意義上可與基督教中的神秘隱修地相比較。全島共分佈有七十二座佛塔，其中居住着大批佛教法師。島上以其財富和多變的氣候而最引人注目。島上供奉着佛像，這些佛像既顯得野蠻又令人望而生畏。隱修處均被神秘地隱蔽在美麗的森林中，森林的各個方向均鋪有漂亮的石板路。甬道由無數大樹形成的茂密森林遮

蔭，陽光似乎從未透射入其中。隨着我們在森林迷宮中前進，又有一大堆東西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每時每刻都有新的美景展現在面前，諸多石刻把我們引向了遙遠的唐、宋、元時代。那裡有巨大的山崖、孤立的岩石和堆得奇形怪狀的峰巖，上面用大字寫着本處主神的名字。還有些地方建有供奉低級神靈的亭子。全部建築都按多種多樣的樣式而落成，可以透過樹葉或面對昏暗山道而遙望之。再遠一些是許多自然形成的山洞、溝壑，這一切都可以使人聯想到阿爾卑斯山的風景。最後是清澈見底的溪流，這一切說明，我們已接近主寺中僧侶們的居住處了。主寺中有二百多名僧侶居住。佛寺大雄寶殿大門的直徑與高度均在 50 尺以上。佛像有 30 尺高，至少有 10 尺寬。雖然佛陀是印度人，但這裡供養的佛像都酷似中國人。大雄寶殿門口掛着法鼓，其直徑也有 150-200 尺。

普陀的和尚們過獨身生活，遵守佛教戒律，每天唸經。但中國人卻將和尚們視為社會最底層的人。普陀寺廟中的方丈平時大都居住在寧波，寧波也有人數眾多的僧眾。他們祇在某些隆重的日子才上聖島。每天都有大批朝山拜佛的香客湧向那裡。

法國傳教士加略利對普陀山的記述最詳細也最生動，篇幅冗長。筆者祇略作介紹，由此可見普陀佛教的發達，僧侶的眾多和香火的興旺。

英國侵華遠征軍秘書喬斯林的《遠征中國》 或者是《英國遠征軍的六個月》⁽⁴⁾

喬斯林子爵（Viscount Robert Jocelyn, 1816-1854）是英國侵華遠征軍軍官，曾作為軍事秘書而參與了英國 1840 年對中國的遠征。英國這次遠征是為報復和懲罰林則徐於 1840 年 1 月封閉廣州關而發動的。當喬斯林到達澳門時，由英國水師提督懿律（Elliot，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之弟）指揮的英國艦隊已經向北駛去，以就林則徐在虎門銷煙給英國人造成的損失而向中國皇帝索賠。當英國艦隊於

1840 年 1 月初到達能夠遙望到定海的舟山群島時，便敦促中國守軍投降。由於中國軍隊拒絕投降，英國便發動了攻擊。鴉片戰爭的結果之一，便是寧波港對外國貿易開放，這也是西人蓄謀已久的事了。喬斯林對寧波和舟山群島作了描述。

我們進入了定海這座漂亮的港口。由於天氣很晴朗，所以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大海附近的海灘和高地，那裡有無數居民。定海城郊一直延伸到海邊，並在海岸形成了碼頭，沿海岸可以看到商船帆檣如林。當英國艦隊駛入碼頭時，有十一隻中國戰帆船首先向我們駛來。但隨着我們破浪前進，中國船均後退並相繼佔領不同位置，最後在商船之前排成一行，以保護商船和海岸不受英軍襲擊和入侵。中國那些簡陋的戰船，通過其紅亮的火舌和炮口被塗成紅色的大炮，很容易被辨認出來。每隻戰船的船組人員都有五十多名。我們的右側是一個約有 200 法尺（pied，每法尺相當於 325 mm）高的山坡，山頂有一座寺廟，大清兵勇們於那裡構築工事。如果他們稍許懂點軍事藝術常識，那也會在此處修些防禦工事，從而給英軍造成嚴重損失。駐紮在該山上的大清兵勇，最低估計也有 800 人。中國軍隊擁有六門大炮，但他們既不會搬動它們，也不會瞄準發射炮彈。在定海城郊前的海灘上，建有幾座寺院，還有三十多門大炮，並不比其它大炮更具有多少殺傷力。在海灘中央一個小炮臺上，有八門大炮。海灘共駐守六千餘名士兵。那裡還有大批民團協助防衛，他們運來成袋的糧食並挖掘戰壕。但我們很難確切估計中國駐兵的總人數。

在整個夜間，海灘出現了一幅壯麗畫面，附近的山崗與城郊酷似一大束流光。在寧波，任何中國人不攜燈籠是無法於夜間出門行走的。燈籠係用紙糊或絹紮，拴在一根竹杆上，用手提着。在燈籠光線搖曳照耀下，我們發現有許多人正忙於修建掩體，但建得也很粗糙，準備在那裡設置新大炮。那些商船也利用夜幕掩護啟錨，揚帆向

大海偷偷駛去。船上的商品堆積到了半桅杆高，船艙中還擠滿了婦女和兒童。這些船隻暢行無阻，儘管其艙貨可以使不祇一個船長致富。

1840年7月5日，英王陛下的國旗最終在天朝帝國最漂亮的島嶼普陀山島上飄揚起來了，歐洲的戰船作為戰勝者而首次耀武揚威地在那裡停泊。8時許，英軍水師提督發出了準備戰鬥的信號，但他不想把事態推向極端，在下達最終命令之前，仍在等待中方仔細斟酌。下午兩時半，威爾斯利號艦才首次開炮，共持續炮擊九分鐘。炮擊停止後，我們發現了一大批廢墟，先前海岸上的許多人開始向四面八方落荒而逃，有些人將受傷者運進了城內。我們登陸後，發現定海海灘上到處都是橫七豎八的伏屍、弓弩、大炮、折斷的兵器。到了晚上，中國的文官和幾名武官均被英軍的炮火擊斃。巡撫被其部下斥責為膽小鬼，而被迫跳水塘溺水而亡了。

次日清晨，英軍從定海城周圍的高地上發現，該城已被中國軍隊遺棄。山谷中有無數人在四下奪路逃命，各自攜帶他們最珍貴的物品。由於過護城河的大橋已被摧毀，英軍被迫略作停留。城門已經關閉，在城牆上還不斷地向英軍發動抵抗，但英軍很快攀上了城牆，英國國旗很快就在定海城上空飄揚了。城牆上到處堆着長矛、火銃和一種帶箭矢的火箭，還有準備向攻城者拋撒的石灰粉。英軍司令部的幾員將領在一名翻譯的陪同下，進城安民，其餘軍隊則駐紮在護城河彼岸。定海城的主要街道已經幾乎荒無人煙了，有幾個被嚇昏了的平民百姓向英軍叩頭。當英軍進入寺院後，發現男女老少都在佛像面前焚香祈禱，其他的人通過小巷而逃往農村。事實上，該城的大批珍貴物品都是被搶劫者們搶走的，而不是由其真正的主人帶走的。英軍進入了定海總兵府。它在通向第一道院子的大門上，裝飾有兩種很大的奇怪圖案，據說是代表着司法公正和懲惡揚善。其院子的一側是審判大堂，擺設有令人毛骨悚

然的刑具、夾手板和竹板。內宅的第一間房叫作先祖祠堂。在一個露天院子的周圍，便是師爺們的辦公處，某些未寫完和被遺棄的公文，說明了他們撤離該城時的倉促程度。在茶几上還擺着仍在燃燒的煙袋、倒滿茶水的杯子、官服和官帽，一切都混亂無序。總兵妻妾們的房間中佈置有奇怪的傢俱，堆滿了各種各樣具有不同用途的衣服。供中國女子使用的絲綢、扇子、瓷器、繡鞋、手杖、胭脂瓶、化妝用品等一應物品，都被拋撒得遍地皆是一片狼藉。

在鴉片戰爭中，英國侵略軍用武力打開了寧波港的大門，通過不平等條約而使之成為通商五口之一。英國侵華遠征軍的秘書喬斯林的親筆記載，證明了寧波港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也證明了它在中外貿易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安娜·諾布爾夫人《雙桅橫帆船吉德號在中國海岸翻船，船組人員及乘客被囚記》⁽⁵⁾

184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基特號船(Le Kite)的船長諾布爾(Noble)攜夫人安娜·諾貝爾(Anne Noble)來華。在鴉片戰爭期間，基特號船負責為英國遠征軍運輸軍需給養。1840年9月15日，諾貝爾夫人與其幼子正在船上，該船突然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寧波海面一個沙洲上翻沉。她失去丈夫兒子，最後連同沉船中的其他幾個倖免於難者，被中國人救起並遭清朝政府的欽差囚禁。在五個月之後，由於英國遠征軍侵佔舟山群島，這些被囚禁的英國人才得以獲釋。諾布林夫人於其致在澳門的一位朋友的長信中介紹了她在1840年9月中旬至1841年2月26日被囚禁於寧波和舟山時的遭遇。

1840年9月10日，基特號船離開澳門返回舟山群島，直到9月15日，一切都很正常。大家本來希望最晚也可以在17日到達舟山群島。但15日臨近中午前後，當商船行駛到距寧波不遠的地方，卻撞到一片任何地圖都未曾標明的暗礁。大

船隨着一聲巨響，便向一側傾斜了。除了諾布爾夫人的孩子之外，所有人都被翻入了大海。諾布爾先生當時正在甲板上指揮撤退。當他返回船艙尋找其孩子時，也如同其他人一樣被捲入了洶湧波濤。他向我喊的最後一句話是：“安娜，堅持住！”我的孩子應該是死在其搖籃中了。我抓住了原來用於固定懸掛船尾小艇的一根鐵棍，才勉強在大浪中逐波漂流掙扎。有一隻小狗於我的胸膛下避難。但由於後來我疲勞至極，祇好拋棄了牠。商船的二副道格拉斯（Douglas）與我同時浮出了水面。船組人員中的某些人，也逃到了傾斜的船體頂部。我的丈夫與孩子都死於海難了。道格拉斯讓大家用沉船碎片紮成一隻筏子，以便在漲潮時將我們沖上鎮海海灘。

9月16日星期三大清早，海浪把我們五位受難者沖上了鎮海海灘。一直到17日我們才遇到了一隻漁船，我們請求艙公把我們帶到舟山群島。但艙公拒絕向我們許諾任何保證。這隻船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小海灣，但很快就有大批中國人將我們團團包圍起來了。他們似乎沒有敵意，友好地送給我們米飯吃。一直到9月22日星期三，我們才被帶到了寧波。我非常高興地在這裡遇到了我的朋友道格拉斯，並獲悉他受到了比我更友好的款待。我還獲悉基特號船上的幾乎全部人員，都被寧波人救上了岸，其後又被投入了該城的監獄，而我的親人卻永久地葬身於海底世界了。

我在寧波還遇到了另一位船長安斯特拉瑟（Anstruther），他從此之後一直是最真摯的朋友。至此，我的痛苦才略有減緩。寧波的官吏們送给了我顏色豔麗的裙子，這些閃光的衣物卻與我的心情不大膾合。我被關進了被獄卒稱為“漂亮牢房”的囚牢中，甚至還給我派來一名女看服侍我。我與安斯特拉瑟船長在一名寧波官吏府上吃了一頓午飯，然後就進入了囚室。囚室骯髒不堪，幾縷陽光祇能透過破牆縫射入。囚室中的全部傢俱祇有一個囚籠（我晚上在囚籠中睡覺，官吏們每次傳我過堂時，我都要鑽入其中）、一盞燈籠、一張破桌子和一個小木凳。自海難上岸

以來，我首次可以換衣服和梳理頭髮了。第二天，三名英國官吏被轉關在一個大囚室中，我再沒有更多機會見到他們了，祇有在官吏府上共同吃飯時才能相見。寧波官吏向我們詢問有關英國女王及其政府、軍隊與戰船數量、其軍官的級別與薪俸等一系列詳細問題。我經常向他們敘述我的痛苦經歷，尤其是當大官吏來傳我們過堂時，更是如此。當那名大官吏來過後，我們便被轉移到了寧波郊區一幢條件較好的屋裡，暫作棲身。

10月8日，安斯特拉瑟船長收到了從舟山群島送來的某些物品和信件，他也分給了我一份食物與用品。直到次年2月8日，我們才接受了中國將軍幾名軍官的來訪，他們向我們保證，我們必定會在十五天內離開寧波。2月22日清晨，那名服侍我的女禁子高呼：“去鎮海、舟山！快起來！”監獄大院被人群堵得水泄不通，我們很難上轎。寧波的所有中國官吏都到場上，一支人數眾多的衛隊護送我們離開囚禁地。我們沿大浹河（甬江）河岸而行，路況非常不好。我時刻都害怕轎夫們從河岸滑落下去。在接近鎮海時，寧波官吏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們。他們讓道格拉斯二副陪同我到舟山，而安斯特拉瑟卻留在海岸邊，以督察大隊人馬登船。但道格拉斯二副反對寧波官方的這項安排，因為安氏船長與基特號船沒有任何關係。大家最後一致決定，他們兩人均留在海岸。26日清晨7時，我非常高興地又見到了許多英國船舶。我在離開那名官吏的府邸之前，曾見到過我們的所有同伴，我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才離開寧波。英國“金髮女郎”號三桅戰艦的艦長送給了我一隻小快艇。我們的難友都到齊了，大家終於安全地離開寧波了。

安娜·諾布爾夫人是在鴉片戰爭期間乘英國侵華遠征軍的運輸船來華，於寧波的鎮海海岸遇海難後被寧波方面救起，隨後又放回。她的記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寧波人與英國遠征軍的不同。寧波人對於敵方遇難人員充滿了人道主義，而英國侵華軍卻對無辜的中國人民大肆屠殺、搶劫和破壞。

法國外貿部官吏奧古斯都·奧斯曼的 《中國、交趾支那、印度和馬來西亞遊記》⁽⁶⁾

法國政府官吏奧古斯都·奧斯曼（Auguste Haussmann, 1815-?）曾作為法國外貿部的代表，陪同法國於1843-1844年派往中國的拉萼尼（Théodore Marie Melchior Joseph de Lagrené, 1800-1862）使團，赴中國作考察。他於1847年返回法國之後，發表了他在中國的調查成果，於1847-1848年出版了其三卷本的《中國、交趾支那、印度和馬來亞遊記》，其中在一章叫作〈中國出口貿易實地考察〉中，描述了舟山、寧波、上海與廈門諸港口。他特別對舟山和寧波的市民生活和不勝收的寧波港口作了親歷性描述。

一、舟山群島的一次婚禮——

定海的居民似乎具有某種溫和而又平靜的性格。其中有許多人在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時逃亡，當我經過那裡時，外逃者尚未回歸。在近一個月期間，我獨自生活在一戶尊貴的中國人家中，在他們中間研究當地風俗人情。我分享了這些忠厚樸實人家的宗法式家庭生活。為贏得中國人的信任與好感，祇要和氣而又平等地對待他們就足夠了。這個家庭的房屋祇有一層，建有不高的圍牆。進門為客廳，其後牆上供奉着主人先祖牌位的神龕，牌位由粗麻布遮罩，使外人無法看到。在某些日子，他們於祭臺前支起一張供案，上面擺好鮮菓、菓醬、烤肉、小點心，再點起蠟燭，全家老少都聚於祖宗牌位前鞠躬拜祖。

這個家庭中的日常生活極其單調。父親已經年邁，平時居住在後院一個小房間中，全天大部分時間都在悠閒自得地抽鴉片。母親和女兒們忙於家務、屋邊的菜園、家禽與家畜的養殖以及烹調。一個女工不時地在一架織布機上紡織粗棉布，這架織布機也成了其家庭財產的組成部分。這個家庭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每天都去上學，在家中複習功課或以放風箏度過閒暇時光。偶爾

有幾個稀客也前來打破這個家庭的寧靜生活。

我出乎意料地在舟山參加了多次婚禮。中國人的訂婚，有時甚至早於未來夫婦的誕生（指腹為婚）。兩家母親可以用訂婚文書作保，如果其中之一未來生男和另一人生女，那就讓兒女們婚配。在舟山可以經常看到十歲的少女已訂婚。如果十五歲的少女尚未訂婚，那就會令家長感到臉上無光，甚至要避免見到其家庭接待的客人。

甚至當少女的婚期到來時，她尚從未曾見過自己的未婚夫。祇有到臨近婚期時，這對未婚夫婦才會見面，並且互相贈禮品信物。雙方互贈的禮物一般為水菓、糕點和烤豬肉。這僅僅是婚姻的前期準備，青年男子必須多趟奔走才能見到其未婚妻。男青年必須支付聘金，因為中國的婚姻往往是買賣式的。一個少女的聘金為300-600法郎，根據各個人的地位等級而厚薄多寡有別。中國人向父親的最佳恭賀就是對他說：“您的小姐很漂亮，值一千兩（8,000法郎）。”一旦解決聘金問題，雙方便商定日子。客人們都要趕到新郎家。我更樂意走進新娘的家。定海的幾個榮譽家庭也曾向我敞開了大門，新郎用轎子來迎娶新娘，轎子盛加裝飾，其中裝滿了鍍金飾物、小塑像、神奇圖像，轎子上部是塔頂，最上面是一隻金鳥。許多女子忙於為新娘搽胭脂盪粉，作滑稽的打扮。案子上擺好了成千種化妝品。伴娘們還在新娘的真髮之上繫假辮子。她們還仔細地檢查新娘的腳，看是否從童年時代起就開始裹足為三寸金蓮，中國婦女都會將少女的腳改造成人造小腳。人們很快又取來新娘穿的一件寬大的紅色大氅。此時便有一個老夫人發出了哭婚的信號，新娘的那些朋友、姐妹、女眷全部聲嘶力竭地同時演奏哭泣合奏曲。他們同時高呼“來啦！來啦！”肩上披一條與大氅同樣顏色的圍巾。哭叫聲一浪高於一浪，老夫人們以雙手掩面拭淚。但我們看到其眼睛始終是乾乾的。因為在這種隆重的分別時刻，在母親和新娘的眼睛中，絕不會有真正的眼淚。最後，人們把風帽拋在少女頭上和臉上，其一個兄弟用雙臂把她抱出了父親家中，

另一個人緊隨其後並向她噴灑幾滴水。人們把新娘抱上花轎之中，並且非常嚴實地把她關在花轎裡。父親無動於衷地注視着所有這些矯揉造作的動作。在父親的這種冷靜的馴服中，本樁婚姻有利可圖的思想，可能於其中起了某種作用。

最後，轎子裡的那些裝飾品被卸空了。人們走出家門並來到大街上左右亂轉，就如同是為了減輕新娘的傷感，或者是為了強迫她擺脫其痛苦一般。新娘的哭泣變本加厲了。人們再次於轎子的上部擺放那些在出門前取下的裝飾物。迎親與送親隊伍同時上路，前面有身穿紅色外套的樂隊開路。在其後，人們洋洋得意地抬着烤豬。繼這些千奇百怪的象徵物之後，便是新婚夫婦的父母和朋友帶着旌旗與寬大的紅色華蓋。新娘子的轎子前後，還有大批運送箱子、褥子和被子的轎子，形成一支浩浩蕩蕩的花轎大隊。有幾個女報信人已向新郎家中通報，新娘花轎即將到達。花轎到達後，便在門前稍作停留，此時便響起了震耳欲聾的鞭炮聲，伴以雜亂刺耳的音樂聲。新郎留在其房間裡，最多是向外面的場景偷偷地瞥幾眼。新娘被蒙在大氅和斗篷之中，兩位伴娘前來迎新娘並扶她出轎，然後把她領向祖祠堂前。祭壇旁擺設一張上置兩根蠟燭的香案。新郎的父親首先出場，在每個瓶子中插兩根點燃的筷子，並唸誦祈禱文。一名文人走上前去，唸誦引自某部經書中的段落。人們望眼欲穿地等待的新郎終於出場了，於新娘右側就座，旁邊站立着兩名伴娘。父親面向祭壇，舉起揖合的雙手，多次頂禮膜拜，新郎忠實地模擬其父的禮儀。他們可能首先祈禱天神，其後再祈禱先祖的亡靈。眾人起立，宗教儀式結束，所有人都走進附近的一個房間。新婚夫妻也進入一個小房間，新娘首次除蓋頭，將其真容暴露在新郎面前。但有時也會使新郎失望，空喜歡一場，因為新娘形象醜陋。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新娘又出現了，她必然會引起議論紛紛。新娘開始洗臉，似乎不關心針對她所講的那些閒言碎語，她要用鉛白以雙手搽臉。然後又有幾個女子卸掉了其少女裝飾，而換成了少婦

衣裝。人們用假花於新娘頭頂上堆成一座山，至少高達2法尺，形成了她的花冠。當梳妝儀式結束後，所有人都在一張放滿美味佳餚的桌子前就餐，並以音樂和舞臺表演相伴。

二、中國最美麗的城市寧波——

寧波城屬於府，也就是一個二級城市，係寧波府府治。寧波城是浙江省第二大城市，人口估計在五十萬人左右。該城位於兩條江（大浹江與慈溪江）匯合處。一條65米長的舟橋將該城與其位於大浹江彼岸的郊區連接起來了。舟橋形成寧波奇景之一。這些槁船被延伸於固定在兩岸的兩條鐵索上，一動也不動。寧波被一道周長約7公里的城牆環繞，城牆高8-10米，基部厚7米，頂部厚5米。該城牆四周共開六座城門，每座城門上面都設有城樓垛口，敵樓由團練兵隊守護，其軍官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們。當我們經過那裡時，許多工人正忙於修復被英國炮兵炸開的城牆缺口。

人們從城牆上，可遙望寧波府茫茫大平原上的美景。寧波城郊包括一片20-50公里地域，其一端始於海岸，另一端結束於從地平線上升起的山腳下。我們於此處可以看到運河、江河和農田，在彼處又可以望見村莊、寺廟和墓地。沿城牆和大浹江周邊，到處都擺着裝殮屍體的棺材。這些棺材沒有保護抵擋風吹日曬的設備，至少必有部分腐朽，遺骸便被暴露在每個行人的目光之下。那些曾享受過某種安寧的遺骸，也被用一個方形的磚石建築物覆蓋着。

寧波無疑是我們遊覽過的中國最美麗的城市之一。有人曾估計其住宅約為十萬幢，但我認為這種估計有些誇大。其城郊延綿於城牆之外兩公里以上的地方。其街道要比廣州更寬闊和更乾淨，在某些居民區具有彼此相距20米左右的拱形門，從而產生了一種格外的美感。寧波的房子既不算高大，也稱不上宏偉，卻顯示出了一種豪華和富麗堂皇的氣勢，這是我們在中國其它地方從

未見到的景致。寧波的店鋪也比廣州寬敞豁亮，佈置得既富有情趣而又美觀大方。商人們站立在一個用桌子堵起來的方形小空間中，從而阻止了顧客們貿然進入。為了與外國人用英語對話，寧波商人使用了一本珍貴的小詞典，即由羅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年）編寫的《漢英會話》。羅伯聃是英國外交官，生於蘇格蘭，於1834年蒞華。他於1841-1842年任寧波鎮海民政長官，1843年任英國駐寧波第一任領事，曾在寧波編纂過《漢英字彙》和《漢英會話》等書。⁽⁷⁾該辭書中包括有許多英文和漢文對照的句子。我們每前進一步，就會發現擺滿各種華麗皮貨的店鋪，還有分別用山羊毛、狗毛、牛毛和綿羊毛織成的毯子，毯子上織滿了奇形怪狀的圖畫。在這些織物的一旁，擺列着幾件奇形怪狀的銅器，售價很低。至於藝術品、珍異物和收藏品，它們普遍都遜於廣州的，不過價格也便宜得多。

寧波城內設有無數咖啡館、糕點店和飯店。據說，寧波大部分家庭都到那裡去解決其吃飯問題。因為他們發現，購買製成品食物比在家中烹製還要經濟實惠。當地人在那裡向貧寒之人大量施粥。這些公共廚房是按照某種慈善制度籌建起來的，由公用火爐上的烹飪器皿加熱蒸熟。我們在寧波大街上每前進一步，都必然會看到用米麵或豆麵蒸成的糕點。

寧波具有大量的歷史古蹟。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可能是一座七層塔，名為敕封塔〔應為天封塔〕，據說建於公元8世紀，早於寧波城的落成。當時修建該塔的目的，完全如同廣州城郊的那些塔一樣，是為了替附近地區招福。敕封塔呈六邊形（六合塔），高約50米。該塔的每一層都有六扇窗戶。整座建築物的牆壁都遭到了嚴重損壞，到處都可以看到很深的縫隙，甚至還從中長出了嫩草，完全是一副殘垣斷壁。過去在塔的每層都有一條帶有弧形頂篷的走廊，但一場火災燒燬了所有裝飾。居住在塔後寺廟中的一個老僧掌握着整座建築物的鑰匙，祇要付他幾文銅錢，他就可以讓外人進入其中。我共計算出十二個階

梯，共一百四十七級。這些階梯就如同樓層與樓窗一樣，隨着接近塔頂，階梯便逐漸變小。大家可以從腳下發現成千的弓形穹頂、許多寺廟、繁榮而又肥沃的遼闊平原、經過多處迂迴而從視野中消逝的大挾江。我在塔壁上發現了法國三帆艦阿爾克梅納（Alcmène）號上多名海員題寫的名字，該船曾於前一年訪問過寧波。每逢節日時，整座建築中會燈火通明，每扇窗戶都挑着一盞燈籠，從而產生了一種令人賞心悅目的景觀。

奧古斯特·奧斯曼是一名法國官吏，鴉片戰爭後不久他便到了已經被迫對外開放的寧波地區。無論是他對於舟山婚禮的記述，還是對於寧波城的描述，都折射出了當時寧波依然繁榮昌盛的景象。西方觀察家善於對中國的風俗習慣作描述，而且以“他者”的目光，觀察深入仔細。他們的記述，也是我們當代研究寧波地區民俗史的重要資料。

英國新教傳教士美魏茶《在華的真實生活》⁽⁸⁾

英國新教傳教士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 1815-1863）是英國倫敦會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之子。米憐於1813年抵澳門，曾協助基督教來華傳教的開山先祖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傳教。美魏茶於1815年生於從廣州到麻六甲之間航行的海面上。由於其父母均為傳教士，他也成了倫敦會的成員。1839年，他被派往中國澳門，從此便在中國居留長達十五年，並在其間斷絕了他與倫敦會的聯繫。《南京條約》簽訂之後，他於1842年到達寧波。當時必須非常謹慎地行事，因為當地居民尚未忘記該地區在鴉片戰爭期間所遭受的屈辱。極具諷刺意義的是，美魏茶本來是前來中國傳播基督福音的，卻被迫首先下榻於一座佛寺裡，後又遷居於一個尼姑庵中，很快又由於議論紛紛的傳言而被迫遷出。1854年他返回英國，於1857年出版其用英文寫的中國遊記《在華生活》。此書於1860年被譯成法文後，易名為“在華的真實生活”。由於他有關於中國國情與

中國語言的知識，所以他於 1858 年再次被派往中國，做為英國駐中國福州領事館的翻譯。1861 年，英國在北京建立領事館後，他又被任命為駐北京領事館翻譯實習生教授。美魏茶於 1863 年逝於北京。筆者於下文介紹他 1842 年後在寧波的見聞錄。

一名英國人來到了距其祖國有 17,000 英里 (Mile, 每英里相當於 1,609 米) 的異國它鄉，置身於一座中國大城市寧波，其城牆便有 5 英里的規模。寧波的居民前不久被英國人的鐵與火從其居所驅趕了出去。生活在這些人中的一名英國人的處境，該多麼艱難啊！因為中國寧波人不僅不會同情我，而且還通過語言、習慣、衣着、宗教和思想而與我們處處作對。由於戰爭造成的混亂，大部分寧波人都難以忍受其傷心的經歷，對外國人充滿了恐懼，仇恨在胸膛中燃燒，天天受嫉妒折磨。這個英國人遠離了其國家和親人，與我在 1842 年末的處境幾乎相同。當我在寧波度過一段時間之後，便發現該城對於我們的意義非同小可，從而促使我更加密切地注視當地人對外國人不同感情的表達。

某一天，我正沿着由顯得格外寬大的房屋環繞的一條長街前進，遇到了一批形色很憔悴的中國人。在經過他們身邊時，我向他們發出了一句禮貌的致意，他們並不回答，而僅僅彼此間議論：“若無‘南京條約’，我們將攻擊這個人！”我祇能以一種苦笑和歉意來回答他們。還有一次我聽到把我們稱作“番鬼”的聲音。這是他們從其先祖那裡繼承下來的稱呼，沒有任何罵人的本義。我對該民族經常表現出的恐懼情緒感到吃驚，尤其是在與他們交往的最初幾天中更為強烈。當我看到所有人都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戰戰兢兢的心情來面對外國人時，感到了淒慘難過。他們根據我那窄腿褲子、帶長下擺的黑西服以及我那英國帽子，即使從遙遠的地方，也會一眼就辨認出我是外國人。在距我 50 米遠的地方，婦女們一看到我，便會帶着孩子望風而逃回家去了，匆匆關閉門戶。當我在大街上散步時，每個

路人都恨不得躲進一個核桃殼中去，以免與我照面。有人面對我時，也會顫抖；有的人偷偷地觀察我手中的雨傘，懷疑傘裡藏匿着一支彈簧槍，或者是我的手指會變成一支袖珍手槍；有的人在接近我時，使用其袍襟或手帕捂住鼻子，離開我時使用力嘔吐。因為他們覺得這些“胡人”會發出一股惡臭的和具有傳染性的氣味。寧波人都張大嘴和瞪大眼睛注視着我，像面對怪物一般。我也對自己引起的奇特反應感到好笑，因為我稍一動，就會使大街上的人群奪路而逃。

在我最早的住宅裡，老鼠成群。這些不速之客的個頭碩大，數量極多，尤其是夜間甚難對付它們。人們甚至戲稱老鼠為“寧波騎兵隊”。它們在房樑間來回跳躍的藝術令人歎為觀止，在我的傢俱上靈活地奔走，成群結隊地巡視我房間的所有角落。當它們襲擊我的食物時，便發出了陣陣歡樂的吱叫聲。我不時地聽到它們的動靜，感到它們那粘糊糊的舌頭在舔我的臉部，有時也會感到它們那冰冷的小爪子在我身上到處亂抓亂撓。滅鼠成了一場永無休止的戰鬥，死鼠的缺位很快就由充滿報復心情的後來者填補。如果說鼠肉也是中國人的一種佳餚，那麼寧波的老鼠則早就在該城的居民中失去了好感。在寧波，捕鼠形成了一種專門職業，鼠皮也有多種用途。捕鼠人在大街上搖響小鈴，尋求主顧。他們肩上扛着一根杆子，上面掛着許多被填塞草料或曬乾的老鼠，有一塊牌子指出了捕鼠人的職業。許多外國人到達中國時，都能欣賞到這樣一景，誤認為中國人愛吃老鼠和田鼠肉，甚至還認為這種說法有根有據。當這些旅行家們返回歐洲時，便發表在中國城市的遊記。書中的插圖便有用一根竹簽穿起的老鼠項鏈的版畫。他們甚至還向年輕人宣揚說，老鼠是中國人的主要食品。

幾天之後，便有流言在佛教僧眾中傳播，說“美先生”（美魏茶）佔據了他們的一間廟堂。我非常害怕受到佛教僧眾們的騷擾。在我下榻於佛寺的翌日，便發現有五名各佛寺法師前來，他們向我提出了許多問題，涉及我的服裝、行李、書

籍等。但他們表現得既友好又好奇，我也從他們那裡獲得了許多資訊。根據他們向我的敘述，以及憑我個人經歷所證實的情況來看，寧波的部分和尚均出自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其中的許多人自幼失去了父親，由其貧窮的母親送去為佛陀効力，僅得幾文錢。有時是父母僅僅出於虔誠，便將兒子賣給佛寺的方丈或住持。有五位法師親口向我斷言，他們自己就是孤兒，從幼年起便進入了佛門，他們當時分別為六歲、八歲、十歲、十二歲和十四歲。我另一次還獲悉，一名母親賣掉了其年僅五歲的兒子，以使他能在法師的照料下生活，而祇得到一筆50法郎的錢。但也有許多法師都是在太齡時受度的。我在定海認識一名法師，他生了兩個兒子之後才皈依法門。他告訴我說，其妻已亡故，但他對兒子們卻毫不關心。

我在這個“城外”寺廟居住一週之後，便決定改換住處，在城東門找到一個新住處。那是一處尼姑庵，供奉着觀世音女菩薩，它近來被改造成了一個文職部門官吏的府宅。由於此處現在閒置，所以我以每月50法郎的房租承租棲身，另外還配備一間廚房、一個客廳和兩間臥室。我立即從寺院搬遷到這裡居住了七天。那些僧侶們必然會招待我一次，否則是不會允許我離開的。我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他們的邀請。晚宴開始，菜餚與“未出家人”的餐桌沒有任何區別。佛教徒們公開聲稱，他們已與世俗人不同，他們完全禁止吃任何有生命的葷腥、蒜類和葷油類食品。我曾見過他們在我的住處甚至拒絕飲茶，害怕茶杯被某種禁物玷污過。無論他們的誠律多麼嚴厲，無論他們的發願多麼嚴肅，根據這些僧人的修持來看，他們的內部生活也不算是嚴守誠律的。該寺院的方丈非常高興地接受了我送給他的一條火腿。一名年輕和尚告訴我，他們在年輕時絕不能貪圖口福。在我於寺廟內居住的全部時間內，該年輕和尚一直幫助我準備齋飯。如果相信某些流言的話，那麼中國內地的所有寺廟都以其修道者們的侈奢生活而著名。在此情況下，我非常想在僧眾們宴請我的晚宴上看一下，他們是怎樣僅以

粗糧（如豆泥和蔬菜一類食物）而力圖盡可能地遵守外界的風俗習慣。初看起來，其菜餚似乎與那些在賓客宴席中端上的菜餚差不多。直到我品嚐到它們，我所看到的一切都使我覺得它們是烤肉或烤家禽。從雞皮來看，它被烤得恰到火候。我面前放着一塊很漂亮的糕點，可是當我用刀子切它時，卻發現是一種蠶豆糕，在鄉村的灶上烤得焦黃。我們還要吃假綿羊肉、假家禽肉、假燕窩和其它用做製產品烹調的食品。但我應該指出，酒是無可指責的真酒，它是一種用大米蒸餾釀製的汁液，此地人稱為“紹興黃酒”。

在晚餐期間，大約到了晚上7時許，前往搬運我的行李的僕人趕來告訴我說，看守我租房間的庵主，請我推遲一、兩天入住，因為她希望對自己的承租人瞭解更多的情況，她對於將自己的一套房租給一個外國人很謹慎。但一切都太晚了，我的全部行李都被運來了。當曾與我交談過的方丈獲知了我的困難後，便自告奮勇地陪同我並代我回答她。我必須立即進入自己的房間。一刻鐘之後，我便到達了尼庵大門前。進入尼庵之後，我被帶到了庵主的面前，她光頭而又抱拳向我致意。當我還禮之後，她開始詢問我的年齡、職業和赴寧波旅行的目的。她對於我的答覆感到很滿意，尤其佩服我能用中國話作答。方丈對我的推薦，似乎在她的心目中感到具有很大的份量。她令人端上了一盤茶和菓醬。她主持下的尼妹共有九名，所有人都匆忙趕到了大門口。庵主自己收留了一個受寵的女弟子，當時祇有十二歲，已拜在庵主門下六年，尚未結束沙彌修持。稍過了一段時間，庵主的怯懦心情已完全消失，她及其弟子們的好奇心都轉移到了一個外國人帶來的所有奇異物品上了，這卻使我覺得相當反感。在分別時，我才深深地鬆了一口氣。我打開自己的一小套藏書，驚奇地發現所有尼姑都會閱讀。我向她們每人贈送了一冊，我們做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而互道晚安。幾天之後，尼姑們請我吃晚飯。這不僅是為了博得我的好感，而且也是為了獲取幾個法郎的佈施。寧波下層社會的人經

常請其主人或上司吃晚飯，其目的是從這些人身上討點錢，這是一種受到社會一致承認和鼓勵的奇特習慣。她們宴請我的晚餐祇有蔬菜、蔬菜和蔬菜，與過去方丈宴請我的菜餚別無二致，祇不過是烹製得更為精緻罷了。這些作法的目的是為了摹倣魚肉與家禽肉的晚餐，從而美化人的想象力，不會使口舌得到任何享受。寧波人以喝米湯而結束晚餐，但在寺庵中卻祇有一杯溫清水。

我剛在寧波尼姑庵中度過三週時光，庵主明確地告訴我，我需要到別處另尋安身之地了。我用手勢加語言表示反對，但她卻以頭觸地地表示抗議，請求我迅速離開其庵。當我看到由自己的存在給她造成不安時，便促使我盡快地離開了。

我離開尼庵之後，又下榻於寧波一名李氏人家裡。他請我吃的第一頓飯便是生吞幼蟹。他們上了一盤帶蓋的菜餚，這在寧波很罕見。當發出某種信號時，有人撤去了盤蓋，餐桌上立即爬滿了小蟹，它們爭相盡快從盤子中逃出來。由於客人已入座，所以他們便將這些小蟹投入醋碟中。每個客人便徒手捕捉雙手能觸及的那些小蟹，塞進嘴裡，再用牙咬碎，毫不客氣地吞咽下去。我也決心依法倣倣，想嚐一次鮮，卻發現蟹殼柔軟而具有膠性。這些小蟹剛出生一、兩天。但我很快就放棄了這種口福，口腔被扎得極其疼痛，從此再不吃這種海鮮了。

中國人的“新年”（春節）之前數日，人們要遵守一種叫作“保安”的禮儀。在寧波城的各區域，都要舉行這種禮儀。這是為了祈求諸神的保佑，並且在接近冬季時不受火災與夜間動亂之苦難。一般來說，它是一種社區性的禮儀，由某一區的居民自籌經費慶祝，各社區的慶祝活動互相交叉，在一、兩個晚上舉行祭祀出行儀式，民眾自願以神香、蠟燭、鮮菓、魚肉、豬肉作為供品，這一切都要以一種奇怪的裝飾物覆蓋。這是為了求神保佑不發生火災，寧波於冬季頻頻發生火災。但就在這個神奇節日的當晚，在寧波發生了一場嚴重火災。整座城市轉眼之間便陷入了一片混亂。火災爆發於寧波主街道的一家金銀店。

大火很快往大街的兩側蔓延，使整個住宅區都面臨着被大火吞噬的威脅。最後，火災在焚燬了上百幢房子之後，才被撲滅。由於這條街是寧波的主要商業街，所以一旦出現險情，所有的僱員和股東都跑來了。轉眼之間，店鋪的所有大門均被關閉，商店的進口設置了守衛，以防止那些盜賊以助救火為名而行盜竊之實。在每間店鋪裡，人們都忙於將商品打包，每包都擺放得能隨時運走。城市當局調來了兵卒與衙役，但他們祇會增加混亂。店老闆拒絕將商品交給兵卒們保管，而是自行將包裹扛在肩上，另一隻手揮動手杖以驅散挑釁者。像寧波這樣的許多中國城市，都配備某些類型的消防水泵，被稱為“水龍”。但在寧波火災這種情況下，即使有此種消防設備，也不會起多大作用。在火光的照耀下，我祇看到幾名衙役爬在附近房屋的頂上，漫不經心地和有一搭沒一搭地潑幾桶水。他們的行為似乎更激起了乘火打劫者的嘲弄。當我看到大火蔓延到了我們社區，便立即讓人將我的東西搬到了後面的一個公園中，而且還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將它們從那裡轉走。我剛辦完這一切，大火便燒到了本人住宅對面的地方。我在一個平臺上監視大火的蔓延過程。突然下面有人用中國話喊我：“美先生在哪里？”我被來人一直拖到了城牆下，他一手抓着我，一手舞動拐杖開路。此人是我的房東。我們突然看到了東門上的一大奇景，從其頂戴與華蓋來看，來人正是寧波知府大人。其侍從發現我之後，便向他作了通報。他迎上我並對我的不幸表示安慰。他於其府上騰出一間住房讓我安身，並且在需要時可以使用其衛生間。半夜時，有人告訴我們說，大火已經被撲滅。我返回住處後，發現房內收拾得整整齊齊，衣箱已經擺放得井井有條，書籍排列有序，一切都像原封未動一般。這要歸功於我的僕人們的反應敏捷和忠誠。

1843年夏，美魏茶試圖離開寧波進入中國內地。當時，中國除了由《南京條約》規定開放的五口之外，禁止外國人在中國內地居住，尤其是禁止傳

教士們隨意到內地傳教。美魏茶為了不讓中國當局識破，他選擇了中式服裝與髮式，但他仍然多次遭中國政府官員揭發，最終於1845年7月7日晚9時，乘寧波北關村的一隻船離開寧波轉赴上海。

寧波有許多重要的佛教建築，形成了寧波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新教傳教士美魏茶對於寧波佛教寺庵的記述，恰恰從一個外國人視野的角度，證明了當時寧波佛教文化的繁榮。

法國博物學家福威勒的《一名博物學家漫步於中國舟山群島和浙江沿海》⁽⁹⁾

法國博物學家福威勒（Albert Auguste Fauvel, 1851-1909）年輕時由於視力不佳，而無緣於他自幼嚮往的法國航運學院，祇好在法國東方語言學院學習滿文。他於1872年蒞華，曾在漢江關任海關二等幫辦。他在華一共居住了十二年。中法戰爭期間，他辭掉了海關職務，出任法國郵船公司稽查，相繼在北京、上海和寧波居住。1879年他受中國政府委託籌辦於1880年4月在柏林舉辦的國際漁業展覽會中國部工作，還奉命撰寫一篇有關寧波橋和舟山群島漁業的論文。這一官方授命使他有機會仔細研究寧波與舟山的自然產品，特別是發現中國的一種鱷（alligator）。1885年他被任命為海運總監。下文介紹一下他有關舟山與寧波漁業的記述。

一、舟山群島捕魚場景及其自然珍品——

舟山群島的某些岩石岬角延伸到了大海之中。我在那裡發現了建在木樁子上並用蓆子覆頂的崗亭。在這個難擋風雨的建築物前面，有一張巨大的矩形網，在一根長竹杆上上下下浮動。這是使用棚罾捕魚的漁民。我從未見過他們從這種設備中放過任何捕魚誘餌。他們都會耐心地等待，有時要一直等待整整數天，魚群才會落入陷阱。漁民們祇會懶懶散散地起網，從而使大批魚兒漏網了。如果有人在網底發現捕住了幾條小魚，也會感到高興，否則就滿不在乎地去抽煙斗，吐出幾縷煙霧並重新陷入沉思之中。當海潮很低時，

漁夫便貼腳跟地蹲在那裡，並以這種一成不變的姿態酣睡。風雨與大海的咆哮聲不僅遠不會驚醒他，相反卻似乎於其身上產生了催眠作用。尤其是暴雨會催舟山人入眠，而且呈其千奇百怪的睡相。為了喚醒他們，則必須猛烈地搖動和用力敲打竹棚。舟山人愛睡而又不大敏捷，這是由於他們體質的原因，也可能是由於他們習慣於植物性而非動物性食物的原因。

我還看見稍遠處許多漁船都在拉大網捕魚。漁網多種多樣，其中有普通的大網，與所有國家使用的那些網大致相同。但有一張中國式的大網，中間是一張呈口袋狀的圓錐形小網，大網捕住的所有魚都集中於小網，可阻止它們從網中蹦出去，因為寧波和舟山的多種魚都極善蹦跳。

在梅山島航道的淺灘上，有一條長達近一海里的巨大堤壩，橫在主航道上，從而可以使它在落潮時攔魚。堤壩呈一個巨大半弧形魚網狀，約6法尺高。在堤壩的兩端及其中心附近，有一些類似迷宮的捕魚設施，受大壩誘導的魚群便會自投羅網。這些迷宮的進口，是上部固定而下部自由浮動的魚網，魚群在水流的衝擊下，爭相向魚網進口方向遊去。當魚群試圖逃出漁網時，反而使漁網被拽得更緊了。這些陷阱的方位由長竹杆所標示，竹杆的一頭一直昇到海水平面之上，拴上一束麻或一塊破魚網作浮動信號。漁民們再用一張手提網從中捕魚。這種攔魚壩與我們在鎮海看到的那種不同，它們都建在永不枯水的淺灘上，屬於建網一類。

我發現在污泥之上，有一種奇怪的物體，它長期以來形成了我的一大謎團。它就如同一個球形或圓錐形的工作臺燈罩一般，呈一種凹面漏斗狀，以一根略呈大喇叭狀的短管子結束。這種奇怪的物體，似乎是用一種粘土揉成的。其體積最小者之外緣最大直徑為8-9 cm，內緣直徑為3-4 cm，平面非常光滑，最寬口沿也很小，並呈波紋狀。祇要它整體沉在水中，便具有彈性，相當結實。但它很難以乾燥狀態生存，一旦乾燥便會化為塵埃。在大海平靜而又清澈見底的地方，大家可以

發現它們有一半鑽入土中，就如同一個真正的漏斗一般，非常巧妙地冒充蟻穴。我於1873年在山東煙臺的海灘上也發現過類似的現象。當然，這既不是魚類的傑作，也不是某種軟體動物的行為。其形狀和姿態，似乎都說明這是一隻沙蟲（沙棲蟲）的巢穴。我祇借助於一張網便捕獲了許多沙蟲，並且還從海底撈出一個很漂亮的玉螺標本。我本來曾懷疑在玉螺和貝殼之間具有某種關係。但經過仔細研究之後，我卻發現玉螺的表面略顯花紋狀。它是由於大批小球狀的、扁平的和彼此由小隔段分開的巢體組成的集合體。我在芝罘（煙臺）發現這些小巢體是空的，於此卻意外地發現了在水中漂浮的兩個很亮的小黃點。經過仔細觀察，我才辨認出這是玉螺的幼殼，在顯微鏡下觀察也證實了我的看法。那些膠泥燈罩般的動物，正是泥螺或黃泥螺。漁民們正是在黃泥中，於某些季節的落潮之時，才能拾到大量的黃泥螺，其學名叫作 *Bullacta exarata Philippi*。這種腹足綱動物頗受寧波乃至整個中國美食家們的高度好評。在寧波的糕點鋪、糖果店中便出售黃泥螺。黃泥螺一般保存在紹興酒中，而且是把它們活生生投入酒罐中的。人們在小銀碟或瓷盤中品嚐其貝殼中的螺肉。寧波人吃黃泥螺，就如同我們歐洲人吃金槍魚或橄欖一樣津津有味。黃泥螺也被作為調味品而食用，其價格異常昂貴。

11月19日近中午時，我發現自己正置身於一個叫作 Yang-So shan（羊少山）的小島。其附近有遼闊的污泥地，人們於上面養殖鹽子。我於是決定在那裡拋錨並去參觀這些漁場。登陸之前，我為了在需要時有東西可吃而獵殺了許多野鴨子。我在水面上打了幾槍，槍聲在島上那些貧苦的漁民中造成了極大混亂。島民們看見開來了一隻無國旗的船（因為我們是借前一天晚上的大雨而駛往那裡的），而且還亂放槍，誤認為是一隻海盜船。當我登上該小島時，發現島上很荒涼。我的水手們最終發現在對面海岸上，有一名漁民正攜帶其行李逃亡。我親自趕上前去與這些逃難者交談，我發現他們（兩位夫人、一個少

女、四個孩子和多名男士）都擠在一隻海島帆船中，揚帆向大陸上的三山森林駛去。我從他們之中獲悉，該島於數年底前曾遭一群廣東海盜搶劫。我最終與這些人交上了朋友，他們讓我參觀其白薯地以及過去遭海盜蹂躪的柑橘園。他們送給我許多非常漂亮的橘子和一簇結滿小金橘的金橘（*Citrus Japonica*）枝。我的廚師用空瓶子和舊白鐵罐頭盒，與當地人交換了大量金橘，寧波海岸的中國人很喜歡這些東西。這些漁民們邀請我到他們家中並請用四枚在熱灰中燒熟的雞蛋、一碗用沒有完全脫皮的大米熬成的米飯、煮熟的白薯和一杯茶水來“宴請”我。我與漁民全家坐在餐桌旁，利用這一機會搜集寧波人捕撈和養殖刀魚的詳細情況。我等到晚上落潮時，才去參觀養殖這些海產品的地方，由於被碧波所吸引，便立即脫掉衣服跳入水中游泳。船老大祇好謹慎地告訴我，圍觀者之中有女子，我祇好到無人的區域去游泳，並且躲藏在生長於海邊的松樹下。由於我正在紫藤樹下休息，於岩縫中發現了許多大壁虎（蛤蚧，又叫蜥蜴）。它屬日本品種，其乾皮磨粉可製作各種藥膏。當我返回甬江畔時，遇到了一批漁民，他們為船長帶來了清水煮蛋，為水手們帶來了魚和蝦等禮物。

晚上我返回小島，對該島作全面考察，特別是研究其地質與植物方面的情況。該島地面由石英岩組成。由於季節太晚了，很少有開花的植物，主要有紫菀與茶樹。我還發現了杜鵑、白花、鐵線蓮和梔子。梔子那橘黃色的菓實可用來染絲綢，也可用作油漆傢俱的底色。一種生長在山崖上的藤子長着圓形寬葉和小珊瑚狀紅葉。還有一種扁圓形的柿子（*Diospyros kaki*），其直徑有1.5cm。這就是羊少山上的所有植被。

二、向寧波方向奔騰而去的奉化河——

11月3日下午1時許，我們抵達將我們與寧波平原分隔開的秀麗山脈之巔。下山速度很快，也沒有多大困難，但我們在山腳下卻面對着山洪

爆發的江河。特別是奉化江的江水瀑滿，迫使我們在渡江之前長時間地沿江岸而行。這條江於某些地段的懸崖峭壁之下咆哮而過，在那些盤旋的羊腸小徑上不斷分佈着墓葬、烈婦貞節牌坊和名儒碑亭。我的轎伕們最終找到了一個渡口，是用一組巨大的石板擺成的渡江用的“漫水橋”，其上有幾寸深的水。他們勇敢地走上了這條很滑的堤道，卻於中途被一場事故阻止了過江。有些漁民乘竹筏逆江而上，一名漁民過份地深入航道中間而未能沿江岸行駛，被撞在浮橋上，致使整個竹排有一半傾覆於水中，阻斷了我們的道路。那個不幸的漁民在同事們的幫助下，徒勞地試圖將竹排轉過去。這樣一來，我的處境便變得很危急了，轎伕們既不能沿狹窄的堤道折回，更不能把我拋在水中，必須有人從轎子下鑽過去才能給予他們幫助。

我首次在那裡見了竹筏或竹排，稍後又乘竹排漂流六週。要在山澗激流中航行，竹排非常方便。竹排是用十多根長竹子首尾相銜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長四十多法尺、寬與厚均為8-9 cm的筏子。前端像船首一樣向前翹起，為此而必須用烈火將嫩竹烤成彎弓形。有時兩個排互相連結起來，形成長達80法尺的一排組合體。對於那些怕水浸的商品，或為了方便旅客，人們每隔一段距離便在幾寸厚的竹杆上放一些竹編小柵欄。這一切都很方便，很容易被一、兩個人搬走。一個手持帶鉤長篙的人就足以操縱整副竹排。我曾乘竹排在激流中安全旅行，雖然水深祇有1.2cm。

下午3時我才到達奉化城，它是一座三級城市。從那裡乘船沿奉化江航行，七、八個小時便可到達寧波。由於奉化英國新教傳教士威廉姆森(Jas. Williamson)的幫助，我才以一千文銅錢(約5法郎)搭乘一條運紙船於當天晚上到達寧波。

三、寧波城的魚市——

1880年11月24日清晨，我終於在寧波魚市上岸了。這次旅行共持續九天。寧波魚市位於

東門附近的大浹江畔，就設在城牆下，與福建漁民們修建的那座著名的佛塔——寧波最漂亮的塔相鄰。每天早上五至七時之間，在那裡始終有一場大規模的人群流動。舟山、鎮海與其它地區漁船上的多名少女，都陪同寧波“冰船”停泊在碼頭上。鋪大塊砂岩石板的港口碼頭，由於海水和碎魚屑而變得很溜滑。人們在這裡為“尼妮羅松”號船卸貨。這些船中裝滿了沉重的小木桶，裡面是尖鰻魚，取自一條江船的活魚池中。更遠的地方，碼頭又堆滿了扁平的長方形的木桶，木桶中貯藏着活鯉魚或淡水魚黑鱧皮(*Ophiocephalus niger*)。在冰船的底艙，可以卸下大批帶魚(*Trichiurus*)，它們是在舟山群島的海岸捕撈的。人們將帶魚切成兩段，再堆放在如同船體上那類的木桶中，也從中加入濃鹽水。經過這樣加工之後，再用商船把它們運往內地銷售。最後，還有芝罘船將在山東海岸岩石上曬乾的大包乾魚也運到寧波，從南方來的帆船則運來在臺灣海岸捕獲和燻乾的海參。許多包裝嚴密用漢字明確標明來自日本的貨箱剛剛由汽船運至。這些箱子中有大塊的鮑魚乾，這是中國人貪吃的佳餚。

寧波有許多魚商店鋪。這些商店一般均有兩個門面，其一朝碼頭開放，其二則朝與碼頭並行的另一條街道開放。門面上方的黑漆橫額上用金字題寫店名。此名稱字型大小也一樣出現在位於櫃檯附近的一個豎牌子上，另一塊木牌上則寫着“不二價”。朝碼頭開放的大門骯髒又擁塞，在那裡進行商品整理打包。大街上的情況卻相反，那裡的一切均整理得井井有條，魚被非常乾淨利索地擺放在那裡。在外面的石板路上，我們發現了裝滿活魚、活蟹和剝掉礪殼的螺的木桶。這些海鮮都被保存在海水中，從而使它們變得更加令人倒胃口，而不是增加食慾。我們看到那些剛剛被魚船運來的海魚都被擺在肉案上或被用鉤子吊了起來。我於此發現了許多幼小的鯊魚、鯛鯖和金槍魚，非常驚奇地發現了兩隻很漂亮的龍蝦，因為在寧波海

岸上既看不到龍蝦，也沒有蟹蝦。在對這些“龍蝦”仔細研究之後，我辨認出它們是日本的“三角龍蝦”(Palinurus trigonus)，有時可以在舟山群島的海岸捕撈到它們。在魚店的案板上，有一大批粗麻布包，包中裝有各種小魚乾。其中特別有三、四種乾貝，有的帶貝殼，有的沒有。其中最小的叫作蝦皮，是我經常愛吃的一種美味。那些貝殼被仔細搜集起來單獨出售，當地人把它們埋在茶樹下，認為那是一種能殺死某些侵害茶樹害蟲的理想殺蟲劑。

每個麻布袋子中都掛着一根竹簽，上面寫有商品價格、名稱和品質。在沿牆根事先放的大木箱中，都是最普通的乾貨：刀魚、貽貝、烏賊、無鱗魚、魚翅、各種小乾魚；此外還有某些醃貨，特別是刀魚、海蜇和各種小雜魚。

在那些抽屜的上部，保存着最珍貴的乾貨：海參、蠔、乾蟹血。此外還有分別呈薄片狀、圓盤狀、帶狀的魚鰾膠，還有綠藻和多種海藻。在店鋪的中間，擺着漆陶罐，其中有海水中收藏着成品海鮮，主要有貽貝、刀魚、海蟹與河蟹、蟹肉、牡蠣(蠔)、田螺。我在店鋪的後面發現巨大的蓆席和粗布包，內裝很大的乾魚，大部分均產自中國北方。那裡至少有二十種魚、三種鱈魚、小沙魚、鱒魚、小鯡魚、黃蓋鰈和比目魚等。我還在寧波發現了田螺，在酒中保存的蜆螺以及保存在雙耳底甕中的各種調味品。所以這一切均按重量出售，用一根桿秤來稱份量。我們在位於一層的商鋪中，發現許多小竹籃、普通陶土罐和瓶子、袋子、包裝紙、小線繩、竹葉等。這一切都是為了供銷售商品時打包使用的。包着竹筍的“竹葉”實際上是竹子那碩大的菱形外殼，用來製成圓錐形紙袋或盒子等使用。漁民們也在店鋪裡採購已經編織好的燈蕊草草鞋，他們在船上都穿這種鞋以防水和防滑。

在店鋪中出售的所有商品中，最奇怪的一種叫作“乾蟹血”，由在甲殼動物的內臟中提取的液體組成，人們將它倒在一個瓷杯中，再放在太

陽下曬乾或放在溫火下烘乾，這樣就可以得到半球形的餅，呈黃棕色。為了服用它，人們一般均將它溶化在熱水中。

總之，法國人自然學家(博物學家)、海關官員和旅行家福威勒最關心的當然是寧波的自然產品。在寧波港，他又特別關心那裡的魚類產品及其養殖和捕撈過程。這一切都說明，寧波及其所屬的舟山，不僅是中國對外貿易港口之一，也是中國最大的天然漁場之一。其海產品不僅供當地消費，而且還要銷售到中國內地，甚至遠銷海外，特別是日本。

我們通過16世紀以來西方那些不同職業和懷有不同目的士對寧波地區的記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寧波不僅是中國的一個重要的國內和國際貿易港口，也是對外經濟、文化和宗教交流的視窗，並為中國最大的魚場之一。寧波隨着整個中華民族的繁榮而繁榮，也隨着中華民族的屈辱而遭受恥辱。寧波及其附近的舟山地區，在海上絲綢之路上，佔據着重要地位。

【註】

- (1) Louis-Daniel le Comte: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1687-1692, Paris, 1696.
- (2) 此處的“定海”實指甬江畔的鎮海。此地於宋代稱定海，清代改為鎮海並將定海遷至舟山群島。
- (3) J.-M. Callery: “Voyage sur les côtes de la Chine fait en 1838”, extrait des *Nouvelles annales des voyages*, 無出版時間。
- (4) Lord Robert Jocelyn: *La campagne de Chine, ou six mois avec l'expédition anglaise*, Paris, Delloye H. éd, 1841.
- (5) Anne Noble: “Naufrage du brick Le Kite sur les côte de la Chine”, et relation de la captivité de son équipage et de ses passagers, in *Nouvelles annales des voyages*, t. LXXXI, 1841.
- (6) Auguste Haussmann: *Voyages en Chine, Cochinchine, Inde et Malaisie*, 3 vols., Paris, G. Olivier, 1847-1848.
- (7) Robert Thom: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1842; *The Chinese speaker*, 1846.
- (8) William C. Milne: *La vie réelle en Chine* (1857), Paris, Hachette, 1860.
- (9) Albert Auguste Fauvel: *Promenades d'un naturaliste dans l'archipel des Chusan et sur les côtes du Chekiang*. Cherbourg, Imprimerie C. Suffert, 1881.